

生命个体与客观现实的冲突^{*}

——《黄昏》、《边城》及沈从文的创作道路

徐 晗

(宿州学院 中文系,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在沈从文的作品里,人并不表现为一个个的个体,而是消融于集体之中,当生命个体与客观现实发生冲突时,生命形式最终走向毁灭。从作家本人坚守理想的文学阵地而遭受重重挫折亦可见此意识体现。

关键词:生命情境;现实;均衡;冲突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6)02-0059-03

时风变易,相当长一段时间被埋没的沈从文及其作品终被发掘出来,被重新诠释,散发出本来应有的光彩,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本文试图以沈从文的《黄昏》和《边城》两个文本为例,阐释沈从文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个体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审美空间。

一、《黄昏》:集体性生存与个体的毁灭

传统上对沈从文的评价多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的去考察分析。由此解读《黄昏》,从中可以看出在毫无道理的死亡随时可能到来的时候,人们对死亡的麻木,以及军阀斗争等黑暗的社会性因素对正常健康的人性的戕害。这未尝不可,但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新的巨大的阐释空间。我们可以发现生命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表现为个体生命的觉醒和自我选择,而是个体生命对一种集体性生存的自觉服从。在这里死亡不再作为生存的对立面出现,它不再是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意义也不再随着个体的毁灭而丧失。个体毁灭了,但他的生命却可通过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嘱咐而继续发挥作用,作为集体性(家庭、家族等)生存的一个部分,使生命的意义得以延续。

在这种生命形式里,人并不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是消融于集体之中。就像《黄昏》里揭示的那样,在生命即将被剥夺的时刻,死刑犯的临终遗言竟是:“大爷,我若上人来时,请你告诉他们,我去了,只请他们帮我还村中漆匠五百钱,我应当还他这笔钱……”^{[1]382}作为规范人群的所谓天经地义的欠债还钱的规矩,原本是为了维持和保障日常的社会秩序而约定俗成的,它是维护集体生命形式的必要手段。到了这里,在个人的最根本的生命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死刑犯在临刑之前,无意识驱使着他仍遵守着这些不成文的集体性生活的规范和习惯,似乎如此便可死而无憾了。他所感受到的只是集体性的存在,并不能觉得有一个个体的“我”的存在。

然而,在这样的社会里,现实的情景却是个体生命的毁灭由偶然变成了一种随时可能存在的威胁,或是因为“欠了一点小债”,或是因为“偷了一点小东西”,或是因为“无可奈何犯了法”,就面临着被杀的厄运。此时,个体的毁灭消去了一切可能的意义,只是将生命变得轻如鸿毛。

“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刽子手从人群中走出,把刀藏在身背后,走近犯人身边去,很友谊的拍拍那乡下人的颈项,故意装成从容不迫的神气,对那

• 收稿日期:2005-12-05

本文系安徽省省级教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法教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2005327

作者简介:徐 晗(1978-),女,安徽宿州人,宿州学院中文系教师,研究方向:文艺学。

业已半死的人嘱咐了几句,口中一面说‘不忙,不忙’随即噤了一下,那个无辜的头颅,就远远的飞去,……”^{[1]379}再来看看孩子们对此的反应。

“在一切人散尽以后,小孩子们就挑选了哪个污浊肮脏的头颅做戏,先用来做一种游戏,到后常常互相扭打起来,终于便让那个气力较弱的人滚到血污中去,大家才一哄而散。”^{[1]380}

死亡的经常性使得临刑的场面不再有任何的震慑作用。人们的生存丧失了庄严感,对死亡也就丧失了恐惧感,对生命形式缺乏哪怕丝毫的敬畏感。由此得以肯定和加强的,也就只能是集体性的生命形态。当集体作为一种绝对强大的力量,可以随意处置个体的存在,“集体”悖离了它出现时的原始目的——保护个体的存在,而成了某些人意志的体现,“集体”成了一种荒谬的存在,于是现实的情境与生命的形式在此产生了巨大的冲突:集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一旦个体生命得不到保障,那么集体性生存就同样会受到毁灭。毁灭了个体的实质也就是毁灭了集体。

二、《边城》:脆弱的幻想之地

《边城》又是一个生命个体与客观现实发生冲突,并最终导致生命形式走向毁灭的故事。沈从文以他独特的优美笔调使这个本来有田园诗般的恬静的故事带上了深沉的悲剧意味,从而使得这个发生在偏地荒陲的故事具有了人类生命形态与历史现实冲突的本质意味。

老船夫和翠翠在《边城》里一直过着的其实是一种超越功利、生死、爱恨的平静、宽容、自足的生活。他们不要求别人给予什么,也不强加于别人什么,“风日晴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与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2]这种生活的自足与完美给人的印象是已经超越了现实而且步入了神性的幻想之地。

这种神性的生活看来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乐土,在整个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说是最为集中的体现了作家“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因无所不在,凡所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

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在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3],这种泛神论的“爱”“美”“神”一体的思想^[4]。

《边城》中有一个最关键的情节是老船夫误将天保视做翠翠钟情的对象,以一种暧昧的言辞将天保和傩送无意间带入了一种竞争的残酷境地。当一切真相大白时,真正陷入两难处境的是老船夫和翠翠自己,“神性”自足的生活从此出现了颠覆的裂痕。《边城》中的悲剧实际上是因为“神性的”生存形式与现实中不能容得下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无论把这种“神性的”生命形式置于何种现实,哪怕是象世外桃源一样美的茶峒小镇,这样一种“神性的”生命形式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老船公这一形象象一面镜子,将之置于现实社会中,照见了常态生活中不符合人性、不完美,甚至是愚昧、残忍的一面。然而这种愚昧和残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很难摆脱,甚至是很难察觉出来。翠翠和老船夫的天真和处事原则又使事情长期得不到澄清,生命形式的自足力量与现实的世俗要求呈现出一种力量对峙的均衡。

这种均衡被打破是由于天保的意外死亡。这种失衡最终导致了那条危险的裂缝趋于扩大并走上了崩坍的道路。天保的死由于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直接对其负责的现实力量,导致了与之有关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微妙的负疚与怨恨并存的心理状态。顺顺、傩送和老船夫的两次接触,使老船夫清楚地感觉到了他们的怨恨。这对老船夫自足的生活无疑是重重的一击。一切都在此被决定了,命运最终使上述的生命形式和现实的对峙的平衡走向了终结。“神性的”生命形式开始了它悲剧性的陷落与颠灭。翠翠和老船夫具有人性的善良、纯洁,这种传统审美原则所认同的特性所成为“神性”破灭的重要因素,这种对于美的撕裂更是加重了“神性的”生命形式破灭的悲剧性。

自足——对峙——破灭,这就是《边城》中“神性的”生命形式具有象征意味的历程。如果我们将《边城》视为沈从文的一座文学高峰并集中代表了他的审美理想,以及他对客观现实的深刻把握的话,我们有理由将《边城》中的生命形式的遭遇视为沈从文全部作品的一个总题,由此我们可以找到沈从文作品中关于生命形式和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诸多例证。

三、沈从文的文学之路：个人命运与文本的交融

这种生命个体与客观现实的冲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靠性是具有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的。它不单表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沈从文本人的文学遭遇也是一个极好的证明。现实像摧毁他的故事人物一样，也摧毁了他自己的生命形式。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或曰，一直饱受非议。这既与他身处的历史环境有关，更与他自己对自己生命形式的设想和践履有关。三十年代文坛的主潮是激进的左翼文学，在对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左翼所持的态度往往有极端化的倾向。这一倾向表现在作品中是对观念形态一味的直露表现，以及对文学形式的轻视，并进而对文学由于艺术规律的制约而表现出的对观念形态的远离大加鞭挞。不幸的是，沈从文的作品正是形式意味远离观念形态的一个典型，为此受到无穷无尽的指责和批评，亦可说是“理所当然”。

这里实际上也涉及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潮流中如何表达自己对时代的看法的问题。作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本应拥有对文学、社会、人生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力，同样也拥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发表看法的权力。这种看法是激进的，是保守的，还是中庸的；是大声呐喊的，还是隐藏在一套文学话语之下的，甚至是表面上沉默不语的，本来对个性习气不同的人来，皆有可取的自由和权力，但在凌厉浮躁和急功近利的时代情绪氛围之中，沉默的权利对知识分子而言无疑也成了一种奢侈，只有大声呐喊者才可以冠之以爱国、革命等堂皇的冠冕，其它微弱的声音或是沉默的愤怒就被列为了批判的对象。沈从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然而，沈从文的看法和他发表这些看法的方式同样遭到了时代及其后来历史书写者的双重拒绝。

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想在文学上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政治保持距离，倾向于冲淡平和。然而，左翼文学主流要求的是所有作家融入时代的合唱之中，而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属于当时的中国革命文学，他的经文化改造社会不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所以他是寂寞的，沈从文也不可能得到特殊的宽许。不过当时的文坛尚处于几种文学力量的对峙

与平衡之中。京海遥隔，左翼自身要参加多方论战，京派作家亦有自己一套完整而行之有效的创作、发表体系，因此沈从文在那种强制要求表态的偏执呼声中，尚还能维持一片“自己的园地”。

到四十年代末期，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某种声音拥有了绝对话语权时，沈从文的生命个体与客观现实出现的一次冲突几乎使他遭遇灭顶之灾。

张兆和在回忆沈从文此时的情境时说：“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韩寿萱当时是北京博物馆的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5]13}时代“不需要”沈从文的“神性”审美理想和文学表达方式。这时的沈从文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转而研究文物了，沈从文实际上失掉了表达的自由。

三十年后沈从文应邀到美国访问，被问及1949年以后为什么要转行，沈从文的回答是：“由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我的工作方式适应不了新的要求，加上早料到参加这工作二十年，由于思想呆滞顽固，与其占一个作家的名分，不如及早让路，改一工作，对于个人国家都比较有意义。因此就转了业，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三十年。”^{[5]40-41}

很容易看出沈从文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是清楚看到了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生命境界和个人化的文学理想的作家，他自己的生命形式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以及他的生命形式显而易见的脆弱性。因此，他的这次转向既充满了能奈天何的悲剧气息，又不得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作家的生命历程就在这里和他所创造的文本一起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互文关系。

（下转第65页）

参考文献:

- [1] [荷]米克·巴尔. 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 谭群强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
- [2]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 天涯. 1997, (5):101-102.
- [3]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8:232-233.
- [4] [德]本雅明. 经验与贫乏[M]. 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50-51.
- [5] [美]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小兵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2-113.
- [6] [美]尼古拉·米尔佐夫. 什么是视觉文化[M]. 王有亮译. 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1998:210-211.
- [7] 邱华栋. 天使的洁白[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19-121.
- [8] 卫慧. 上海宝贝[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8-62.
- [9] [捷克]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65-269.

Desire Devil Jar was Reversed ——the World of Weihui's Fiction Discourse

WANG Wen-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9)

Abstract: The fiction of weihui displayed a crazy picture one by one which following the desire devil jar was reversed in consum society. In her fiction, the crazy desire standing for the rational thinking, another present-experience upsetting completely tradition, graphic trend, femal privacy discourse owing to her, who borned in 1970s, expressing a moods of century end. But she has lost sheself finally, the rational spirit of creation was absent, the meaning of lecture disappeared, and all of this leads to that her fiction becomes a self and reality which cant be profound under the popular vaule covered.

Keywords: desire, consumer age, popular value, new mankind, privacy discourse, lecture spirit

(上接第61页)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 第5卷[M]. 香港:三联书店,1992.
- [2] 中国现代小说精品——沈从文卷[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4.
- [3] 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 第5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80.
- [4]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0.
- [5] 陈徒手. 人有病 天知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The Conflicts of Life Individual and Objective Reality —Dusk Bian Cheng and Shen Congwen's creation road

XU Han

(Suzhou institute Chinese department Anhui Jiangsu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In Shen Congwen's works, people have not displayed pieces of individual, but melt in the collective, when life individual conflicts with appearing in fact objectively, the life form moves towards destroying finally. Also can see this consciousness and reflect to stand fast at the ideal literature position by the very heavy setback from writer.

Keywords: life situation; reality; equilibrium; conflict